



莫让课后服务『增时又增负』

半月谈评论员 艾福梅

课后服务是教育部为破解“三点半难题”、提升学生综合素质推出的民生工程。自全面实施以来,其在方便学生接送、减轻作业负担、拓展学生兴趣等方面成效显著,赢得社会认可。然而,与好评相伴的,有不绝于耳的吐槽甚至反对之声。本是利民之举,为何会陷入众口难调的困境?课后服务怎样才能真正实现“叫好又叫座”?

解难题促成长

对于众多双职工家庭而言,孩子早早放学、家长仍在上班是非常现实的尴尬。为衔接家长接送时间,在“双减”背景下,教育部于2021年在全国推行课后服务“5+2”模式,即学校每周5天开展课后服务,每天至少2小时,结束时间与当地正常下班时间相衔接。

“以前经常看到单位的同事为家里谁能去接孩子发愁,要么靠老人,要么就送课外托管班。”银川市市民张晚说,“学校提供课后服务,就解决了双职工家庭接送不便的问题,省了很多事。”

在近期半月谈访谈栏目“校园话题”推出的文章《课后延时服务,为何众口难调?》中,也有不少网民表达了自己对课后服务的认可。北京网民@LM说,课后服务让老人“能有自己的生活,而不是被困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帮忙接送孩子,间接减少很多家庭矛盾”。

除了接送便利,课后服务还承担了学业辅导与素质拓展的功能。目前,各地课后服务大多分为两部分:基本托管,由教师指导学生完成作业、答疑解惑;素质拓展,开展文艺、体育、科技类活动。

这对于家庭教育相对薄弱的地区尤为重要。宁夏吴忠市红寺堡区柳泉乡中心学校校长丁玉才告诉半月谈记者,学校老师主要利用课后服务时间为学生进行语文、数学、英语学科的“答疑解惑”。“农村孩子基础薄弱,回到家里家长也使不上劲。”半月谈记者从宁夏银川市一所

小学的延时服务选课公告中看到,学校分低段和高段为不同年级学生提供趣味编程、科学探究、3D打印、模拟飞行等30多门课程,选择面很广。一些非遗项目,如戏曲、皮影画等,也通过课后服务走进校园。这些多样化的兴趣课,为学生提供了强劲的助力。北京市一所小学的延时课表则偏重各种户外体育锻炼。该校家长表示,这类课后服务弥补了小学生户外运动不足的缺憾,既能预防近视,又能强健体魄,很受欢迎。

“增时又增负”

有人点赞叫好,也有人呼吁取消。在后者眼中,原本旨在“减负”的政策,已经在执行中“走了样”,异化为“增时又增负”的鸡肋。

——收费标准惹吐槽。各地课后服务收费标准不一,从免费到一学期近千元不等,虽远低于校外托管,但仍有家长认为这比免费义务教育“打了折扣”。

——自愿参加遭质疑。课后服务本为“减负”,却因老师常在此时讲评作业或上新课,使得未参加的孩子面临知识脱节风险。这种潜在的向教学内容倾斜,叠加“全班都参加,你不参加”的压力,共同捆绑了家长的选择。

——作业多,户外活动少。许多家长对课后服务的核心诉求,是孩子能在学校完成作业并有一定的户外活动。但由于作业多、场地有限、课后服务老师讲评作业等原因,孩子户外活动不足。更令家长困扰的是,部分学生回家后仍有大量作业

要写,以致睡眠和自由活动时间被严重挤压。

网民@Yan说:“延时课写延时课的作业,放学后回家还要写家庭作业,偶尔还要上一两节兴趣课,根本没空玩。”

——时间衔接依然存在。尽管政策要求与下班时间衔接,但在一些地方,课后服务结束时间与家长下班时间仍存在“时间差”,未能完全解决核心群体的接送难题。

推动课后服务从“有”到“优”

半月谈记者了解到,课后服务出现诸多问题,其根源在于政策理想与现实执行间的复杂落差。

一方面,政策将课后服务主要定位为“解决接送难”和“减轻作业负担”,但用一个统一的时间段和模式去满足不同家庭千差万别的需求,如家长是否为双职工,是否有老人帮带,对素质拓展有无较高等要求等,必然众口难调。

另一方面,开展高质量的素质拓展,需要专业的音、体、美、科技教师和充足的场地、器材。现实中,对大多数学校来说,原有的师资和设施无法满足所有学生的个性化需求。即便课后服务可以收费,但标准较低且用途受限,无法大规模引入校外专业力量,导致教师负担重,服务内容

单一。

更为重要的是,学校和教师依然面临学生的学业成绩压力。这种压力不自觉地向课后服务渗透,使其异化为“变相补课”或“集体作业课”。

2023年底,针对课后服务实施过程中出现的一些不规范行为,教育部办公厅等四部门联合印发《关于进一步规范义务教育课后服务有关工作的通知》,提出“五个严禁”,以提高课后服务水平。

事实上,半月谈记者在采访中也看到一些学校切实将选择权交给家长,并通过引进社会力量提升兴趣培训的专业性和系统性。有小学生家长李伟告诉半月谈记者,其孩子班级的课后服务选择灵活,有不上、上一节或上两节等多种选择,家长满意度较高。

业内人士认为,政策层面需提供弹性选择,推行阶梯式放学政策与差异化收费,真正匹配家长下班时间;学校层面要进一步丰富内容,引入社会专业资源,建立“作业辅导+兴趣社团”的多元模式,既减轻教师负担,也能满足学生多样化需求;家长层面需合理预期,理解课后服务是普惠性、保底性的公共服务,难以实现完全个性化,同时有专业特长的家长也可以参与到课后服务中,丰富课程资源。(据新华社11月18日电)



从“村超”到“苏超”为啥都能踢进你我心门?

□记者 何磊静

从贵州榕江的“村超”,到江苏“十三太保”的“苏超”,草根足球这股清流,从乡野和城市的不同土壤中奔涌而出,汇聚成中国基层体育的滚滚热浪。

一个是西部欠发达地区,一个是东部经济大省,从“村超”到“苏超”,都没有天价球星,亦无过度商业包装,却以最质朴的方式火爆出圈,点燃了亿万普通人的足球热情。体育的本真,原来可以如此动人。

草根足球一路“超”的,不仅是地理的距离,更是观念的壁垒、参与的边界和发展的想象。它告诉我们,体育的根在群众,体育的魂在热爱。

有人说,“村超”和“苏超”之所以能火,是因为它们“太真实了”。

真实在哪?在仅有几十万人口的贵州县城榕江,一个个你我身边天天可能遇到的卖肉摊贩、种地农民、工地工人,换上球衣,精气神一变就成了球场上的英雄;在城市化高度发展的江苏,同样是人们身边的体育老师、维修工、程序员,下班后一扫疲惫,直奔绿茵场。

说到足球技术,他们未必精湛如专业球员;但球场上一个个奋力奔跑的身影,打破了体育赛事的“精英叙事”,也让观众找到了贴近生活的“代入感”。当足球从一种“被观看的表演”回归到老百姓“可触摸的生活”,“村超”“苏超”上场下场的每个人,都找到了久违的快乐。

人人可参与,人人能享受。这种“接地气”,既构建起赛事与观众共同情感的坚实纽带;也如同一面镜子,映照出今天中国基层社会活力与创造潜力。

“苏超”为孩子们中高考贴心“让路”,把比赛安排在假期晚间;“村超”中响起的不是流行金曲,而是侗族大歌、苗族舞曲;赢球的奖品是一头猪、一只羊、几只鸡鸭……这些细节,不是策划出来的“营销梗”,而是来自乡土市井的泥土味、烟火气。

“村超”“苏超”之所以动人,也许正是因为那份“未被过度修饰”的纯粹。中国体育的未来,既要看成绩突破,又要看群众基础;既要培养精英,也需构建广泛参与、充满活力的基层生态,让老百姓都能热爱体育、参与体育。

“草根足球”出圈,绝非仅凭民间力量一腔热血。“村超”“苏超”繁荣的背后,更是一场政府与社会的“双向奔赴”。

贵州大山里的“村超”,地方政府没有大包大揽,而是退后一步,甘当“服务生”,做好保障场地、协调资源、推动融合等工作。赛事怎么搞,规则怎么定,怎样“玩”起来,交给村民自己说了算。这种“民间主办、政府服务”的模式,既保留了赛事最可贵的草根气息,又注入了公共服务的人性温度。

在“苏超”,我们也看到了政府“不越位、不缺位”的治理智慧。13座城市联动,赛程动态调整,高温天改为两周一赛……看似细微的灵活调度,背后是精准的民意捕捉和精细高效的组织协同。

榕江县建有数十座免费开放的标准足球场,而江苏省万人拥有足球场数量位居全国前列。这些前瞻性的硬件投入是“村超”“苏超”能够成功的基础。但真正让业余赛事“活”起来的,是治理的“软实力”,是一种在群众自发与规范发展之间寻找平衡的智慧。

当管理部门从“台前”走到“幕后”,从“主导者”转成“共建者”“服务者”,有所为有所不为,来自民间的创造力、创新力就会如江河破冰、奔流不息。

“村超”“苏超”为何能超越体育范畴,促进消费、拉动区域协调发展,继而演变为文化展演、社区认同和经济增长的重要载体?

在“村超”赛场,侗族大歌、苗族舞蹈与足球竞技同台绽放,地方美食与激情呐喊交织共鸣;在“苏超”看台,“水蜜桃加油”“盐水鸭必胜”的趣味口号,以及各赛区融入的地方戏曲、非遗展示,将一场场比赛升级为地域文化展示的嘉年华,让更多人成为家乡自豪、为中国喝彩。这一刻,足球背后注入了更宏大的意义。

不仅是“体育+文化”,更是赛事“流量”变现经济“增量”。在“村超”带动下,榕江特色美食与乡村旅游广受欢迎,一个小县城年旅游综合收入突破百亿元,影响力走出大山、迈向全国。“苏超”更催生了串联城市“吃住行游购娱”的“票根经济”,仅前7轮赛事就撬动多场景消费超380亿元。

基于地缘和共同爱好的集体狂欢、社交互动,起到了重建人们对所生活的城市、乡村、社区的认同,为缓解现代都市人的疏离感提供了解决思路。一场看似短暂的球迷流动,正在转化为持久的情感纽带与文化向心力。

我国拥有14亿多人口的超大规模市场。珍视从基层焕发的民间智慧,就有足够的空间孕育出一个个新“超”。它可能是一场体育赛事,一场群众演出,或者超出我们想象的别的样式。

我们期待更多“村超”“苏超”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发芽,让更多平凡的角落,滋养出不平凡的梦想。(据新华社11月18日电)



本版图片由AI生成

